本书的体例仍是多篇论文的集合，主编李华瑞写了一篇同书名文章作为代绪论，比较全面的回顾了“唐宋变革论”的来龙去脉，其它文章各自就“唐宋变革论”的一部分，或是社会史的，或是军事史的，抑或是政治、经济史的展开讨论。本书也可以说是综述的集合。笔者暂且只粗读了本书的前四篇文章，略作一小结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本书出版于2010年，此为本书研究范围的下限。

就笔者所观察的，无论是在狭义的“唐宋变革论”（特指内藤湖南开创的理论体系）框架，还是在广义的“唐宋变革”（指通盘考量唐宋时代的巨变，本书的写作多取这一种，有时将任何唐宋之间的变化也都放入了“变革”的框架中，其实并不符合原意）中考虑，学者们一般只关注由唐至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但却很少有学者从“唐宋变革论”（无论广义、狭义）的基础上，分析由宋入元，“变革”留下了多少，又有多少在易代之际消失殆尽。仅就笔者的分析，“士与皇权共治天下”的政治制度（在本书中，笔者未看到有任何的“唐宋变革论”者谈到这一点），募兵制都没有被元朝继承。而就部分学者（如漆侠）的分析，明代前中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要逊色于宋代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只关注“唐宋变革”是远远不能理解宋以降的中国历史的，反要被唐宋间的巨大变革所迷惑，以为此代表了宋以后中国社会、政府的一般特征。

另一点“唐宋变革论”所具有的缺陷，则是无论赞同内藤湖南的“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”一说，还是否定其意见的，并没有严肃、认真地分析何谓“近世”。在《“唐宋变革论”的由来与发展》一文中，李华瑞对按西方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做法颇有微词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西方“近世化”或“现代化”道路既有其特殊性，必然也有着不少的普适性，这也是近代科学的基本假设之一。与其说研究者们是用西方的模型不合适地套用在中国身上，毋宁说是学者们未曾分析哪些是特殊性的因素，哪些又是基本的、共通性的因素。就如所谓“资本主义萌芽”一说，笔者从未见到有学者先分辨是否必须要先有科学革命，才能够有所谓的“资本主义革命”，不然拿这个框架套用到罗马帝国晚期，说不定也能发现一些相似之处。综上所述，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“唐宋变革论”都是问题重重，完全有必要重建这一概念，不然只是在不牢固的地基上施工，纵然用工至深，待到大地一震，能够留下来的东西少之又少。

就单篇文章来说，张邦炜的《“唐宋变革”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》比较全面的评述了对唐宋年间社会史研究的成果，很有收获，但能够进入“唐宋变革”框架的并不多；《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》则分析的是军事制度，笔者原以为由征兵制到募兵制的变化足够占据一半以上的篇幅了，但没想到仅仅只是一小部分，尚有禁军、武官制度、后勤问题、人事网络等等。《2000年以来唐宋军政变革研究概述》是对上文的补充。王化雨的《“唐宋变革”论与政治制度史研究——以宋代为主》分析的是政治制度，奇怪的是，作者所论述的文章全是站在“宋代皇权加强”的立场上书写的，完全没有考虑另一种趋势，同时也没有分析士大夫的政治地位问题，而且作者还写道：

如何理解，以及如何使用各种概念，毕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，在学术讨论中，似可不必过多纠结于此，尤其不必将精力集中在“语义”的讨论上。以往的研究中，，有的中国学者曾质疑过日本学者的“君主独裁”说，一开篇即引用《大美世界百科全书》中对于“独裁＂的界定来批评佐伯富。这样的讨论，实际只在语言学上有意义，在历史学上价值不大。

真的如此吗？如果作者曾了解过近代语言学的发展，以及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深厚而密不可分的关系，都不会说出这样一番话。看来维特根斯坦所批评的，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。